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与近代革命 / 张守常著.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4.12

(大象学术书坊)

ISBN 7-5347-3610-3

I. ①张… II. 张… III. ①中国—近代史—革命史
②农民运动—中国—近代史 IV. ①K26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0100 号

责任编辑 张锐

责任校对 裴崔 石李

书籍设计 王翠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4

制书 版 郑 州 艾 乐 出 版 技 术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刷

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4 年 12 月 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张

字 数 数 千 字

印 数 数

定 价 价

目 录

自序	(员)
历史教学中的立场问题	(员)
林则徐	(缘)
林则徐答龚自珍书之日期	(员)
林则徐手札受信人刘闻石	(员)
《林则徐信札浅释》补正	(苑)
林则徐临死呼“星斗南”解	(员)
近代中国的“制夷”和“师夷”问题	(园)
太平军北伐	(园)
太平天国北伐军怀庆解围战考实	(猿)
太平军北伐进攻北京诸问题的有关史实	(源)
太平军北伐和北方的群众斗争	(远)
太平天国北伐军数考	(愿)
太平天国北伐军人数考	(怨)
林凤祥的籍贯问题	(员)
《黄生才供词》和《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员)
洪仁玕与中国近代化	(员)
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辨析	(员)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历史	(员)
从拜上帝会到义和团	(员)
中国近代农民与义和团运动	(员)
教民小议	(员)
梨园屯教案和义和团运动	(员)

廊坊《义和团调查记录》过录本说明	(圆园园)
义和团自立皇帝和“扶清”问题	(圆缘缘)
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	(圆愿愿)
中国农民和近代革命	(圆缘园)
甲午战后的历史经验	(圆愿愿)
“洪宪科举”和《呜呼私塾》	(圆园园)
民国初年梁启超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	(圆园园)
一首近代农民革命歌谣的流传	(圆缘园)
近代人物传集述要	(猿园园)
中国近代人名录	(猿园园)
《筹办夷务始末》·《洋务纪事本末》·《总理衙门清档》	(猿猿猿)
许景澄的两种遗集	(猿猿园)
夏燮的“临城司训”问题及其他	(猿猿猿)
“历史教学法”的理论结构	(猿猿园)
回忆赵万里先生二三事	(猿猿猿)
回忆听援庵先生讲课	(猿猿园)
怀念郑天挺先生	(猿猿猿)
记业师张苑峰先生	(源园园)
感谢我校图书馆	(源园园)

自序

不觉已活到八十周岁。朋友们为我祝寿,才感到这个八十岁竟被作弄成为一生旅途的一个“界标”,因而就好像是该回顾总结一下的时候了。于是编辑这本小书就成了大家认为应有的一个项目。

然而惭愧,几十年来我写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其中像样的更不多,编成这个集子是很勉强的。

有的朋友说我“面宽”,这是从我的表面现象得来的看法。我早年曾设想当作家,搞文学,小说、戏剧、散文、诗歌都写过,古今中外的文学也多少接触过,然而很快发现我力有不逮,于是弃文就史。1952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时,从西洋文学系转入史学系,从此皈依于史,就再也拔不出手来了。这样说拔不出手来了也还不够准确,是逐年老大,再想改行也已来不及了。

就史来说,也还是“面宽”,一时找不着重点。考核过《通鉴》编年,研究过明末农民军。写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的推演》,是系里征文比赛,我还得了奖。还写过《从美苏关系看世界和平》,发表在《知识与生活》1955年10月15日出版的一期上。这个题目太大,现在看来都有些发怵,然而那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敢写。这篇文章是有所为而发。那时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接连失利,便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幻想美国打败共产党掌权的苏联,那么连带着也就打败中国的共产党了。在我那篇文章的结尾记得大意说:展望世界,一片平静,美苏决打不起来。说平静,太绝对了,实际上那时冷战已经开始,但毕竟没有真打起来。国民党的一厢情愿落了空。

建国以后,我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开始教了几年历史

教学法 兼教中国近代史。历史教学法自然是从零开始 连参考资料都没有 从自己的和别人的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采集素材。中国近代史 我上大学时没学过 也可以说是从零开始 只能抓紧看书。我的理论思维能力差 所以对中国近代思想家及其思想 没兴趣 不研究 甚至觉得研究不了。由看书 进而涉猎原始史料 主要是注意人和事。我为《历史教学》写了一篇《林则徐》,介绍其生平 是普及性的短稿 谈不上研究 而在有些读者——主要是中学教师中反映颇好 他们讲鸦片战争时总要讲林则徐禁烟 但在此以前林则徐是干什么的 这以后又怎么样了 不甚了了。有了这篇短文 问题就解决了。我并未由此进而对林则徐作宏观研究 反而就其有关的琐屑问题搞起考证来了。可见我作学问之不成气候。

我搜集太平军北伐史料一百多万字 选出五十几万字出版过一本《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80年) 在此基础上写过几十篇论文 后来结集为《太平军北伐丛稿》(齐鲁书社 1983年) 还写过一本《太平天国北伐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对这个课题来说是成气候的 只是这个课题太小 这气候也就太小 放在大空间中 使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至于其他方面 曾有过“从拜上帝会到义和团”这一思路 那也是在以几个革命高潮为线索的框架之内的想法 并无个人创见 也未怎么展开 总的情况是东打一枪 西放一炮 没有一个固定的阵地。

以上就是我“治史”的大概情况 编在这里的文章正也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既然编成一个集子 总得给它起个名字。收在这里的几十篇小文章虽然很杂 但还是以研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居多。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两次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我这一代治中国近代史者 对农民运动的关注也最多 这一点从我的这本文集中也可看出来。因而 就决定以收入本书的《中国农民与近代革命》一文的题目作为书名。

最后还有几篇回忆性的文章 ,主要是回忆我的几位老师 ,也可以说明我之“治史”是学有所自的。不过 ,这几位老师谁也没有教过我中国近代史 ,这里说的“所自”是什么呢?是朴素的学术思想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我学不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但大体上可以说未敢偏离他们的规范。如果说抚今追昔 ,老而无悔的话 ,也仅仅是在这一点上。

圆年 圆月于北京师范大学之乐育四楼

—— 自摇序 ——

摇摇不觉已活到八十周岁。朋友们为我祝寿,才感到这个八十岁竟被作弄成为一生旅途的一个“界标”,因而就好像是该回顾总结一下的时候了。于是编集这本小书就成了大家认为应有的一个项目。

然而惭愧,几十年来我写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其中像样的更不多,编成这个集子是很勉强的。

有的朋友说我“面宽”,这是从我的表面现象得来的看法。我早年曾设想当作家,搞文学,小说、戏剧、散文、诗歌都写过,古今中外的文学也多少接触过,然而很快发现我力有不逮,于是弃文就史。1954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时,从西洋文学系转入史学系,从此皈依于史,就再也拔不出手来了。这样说拔不出手来了也还不够准确,是逐年老大,再想改行也已来不及了。

就史来说,也还是“面宽”,一时找不着重点。考核过《通鉴》编年,研究过明末农民军。写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的推演》,是系里征文比赛,我还得了奖。还写过《从美苏关系看世界和平》,发表在《知识与生活》1957年10月15日出版的一期上。这个题目太大,现在看来都有些发怵,然而那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敢写。这篇文章是有所为而发。那时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接连失利,便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幻想美国打败共产党掌权的苏联,那么连带着也就

打败中国的共产党了。在我那篇文章的结尾记得大意说：展望世界，一片平静，美苏决打不起来。说平静，太绝对了，实际上那时冷战已经开始，但毕竟没有真打起来。国民党的一厢情愿落了空。

建国以后，我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开始教了几年历史教学法，兼教中国近代史。历史教学法自然是从零开始，连参考资料都没有，从自己的和别人的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采集素材。中国近代史，我上大学时没学过，也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只能抓紧看书。我的理论思维能力差，所以对中国近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没兴趣，不研究，甚至觉得研究不了。由看书，进而涉猎原始史料，主要是注意人和事。我为《历史教学》写了一篇《林则徐》，介绍其生平，是普及性的短稿，谈不上研究，而在有些读者——主要是中学教师中反映颇好，他们讲鸦片战争时总要讲林则徐禁烟，但在此以前林则徐是干什么的，这以后又怎么样了，不甚了了。有了这篇短文，问题就解决了。我并未由此进而对林则徐作宏观研究，反而就其有关的琐屑问题搞起考证来了。可见我作学问之不成气候。

我搜集太平军北伐史料一百多万字，选出五十几万字出版过一本《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1年），在此基础上写过几十篇论文，后来结集为《太平军北伐丛稿》（齐鲁书社，1983年），还写过一本《太平天国北伐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对这个课题来说是成气候的，只是这个课题太小，这气候也就太小，放在大空间中，使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至于其他方面，曾有过“从拜上帝会到义和团”这一思路，那也是在以几个革命高潮为线索的框架之内的想法，并无

个人创见 ,也未怎么展开 ,总的情况是东打一枪 ,西放一炮 ,没有一个固定的阵地。

以上就是我“治史”的大概情况 ,编在这里的文章正也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既然编成一个集子 ,总得给它起个名字。收在这里的几十篇小文章虽然很杂 ,但还是以研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居多。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两次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我这一代治中国近代史者 ,对农民运动的关注也最多 ,这一点从我的这本文集中也可看出来。因而 ,就决定以收入本书的《中国农民与近代革命》一文的题目作为书名。

最后还有几篇回忆性的文章 ,主要是回忆我的几位老师 ,也可以说明我之“治史”是学有所自的。不过 ,这几位老师谁也没有教过我中国近代史 ,这里说的“所自”是什么呢?是朴素的学术思想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我学不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但大体上可以说未敢偏离他们的规范。如果说抚今追昔 ,老而无悔的话 ,也仅仅是在这一点上。

一九四四年 八月于北京师范大学之乐育四楼

历史教学中的立场问题

摇摇立场问题 ,是我们历史教学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一切都得从这儿出发 ,不论是处理教材或运用教法 ,倘革命立场站不稳 ,则一切就不可能掌握得正确。这道理在今天似乎已无须详谈 :我们既都生活在阶级社会里 ,而且我们所讲的主要也是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史 ,我们不可能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在我们的工作中 ,随时都严重地面对有关阶级斗争的立场问题 :革命或反革命 ,有利于革命或有害于革命。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不首先重视这一问题 ,而且实际上我们一般也都已在重视着这个问题。

然而重视这一问题并不等于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解放到现在我们一般都已经过了学习 ,且有了些进步 ,一般都已认识到要站稳革命立场 ,要服务于革命。但主要的还不在于认识 ,而在于如何才能把这一认识处处时时地贯彻到行动中去 ,贯彻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去。我们一般都是在旧社会中生活和工作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习惯了的错误包袱是不可能一下就丢干净的。尽管在思想上认识到了要站稳革命立场 ,然而当进行教学的时候 ,却又往往在许多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上离开了革命立场 ,有时会感觉到 ,有时且或感觉不到。我知道有些同志们正为此苦恼。

我自己就有这情况 ,虽然在程度上和有些同志比较起来或有深浅不同。据自己从解放以来在历史教学中多少提高了一些的体验 ,我觉得仅仅有了应该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的认识还不足以处处时时地解决问题 ,这必须还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才行。有了这种革命的阶级感情 ,对革命事业才会热爱 ,对革命敌人才会憎恨。把这种感情上的爱和恨贯彻到教学中去 ,才能敌我分明 ,才能自然地而

不是勉强地站在革命立场上谈问题，才能达到张口就是这样谈，而不是特地留意着才能这样谈的境界。

历史这门课程本身就会推动我们阶级感情的变化。只要我们具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我们就会看到：正义是在被压迫阶级这一面，使我们不能不同情，罪恶则在反动的统治阶级那一面，使我们不能不怀恨。我自己尤其由于这一向主要是教中国近代史，所以在这方面的感觉也比较强烈些。讲到近百年来内外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越讲越生气，特别是讲到 ~~袁世凯~~ 袁世凯 1911 年大革命失败及其以后，对于蒋介石的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真是无法不愤怒。这感情发之于内心，形之于辞色，因而讲起来也就加强了情绪和力量，使得学生不仅用耳朵来听，而且用感情来听，教学效果自然也就加强了。事后想来，那辞色至今和从前显然不同处，就是充满了“他们”和“我们”的字眼，不再是“蒋介石杀共产党”，而是“他们杀我们”了。这必须有此感情才能自然流露，是勉强不来的。倘使无此感情，仅只觉得应该这样说，自然较不这样说为佳，但也会显得生硬而不足以动人。

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学生，而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小，他们的感情纯真而丰富，对爱与恨的感觉锐敏而且强烈。他们不像我们一般都被先入为主的成见阻碍着，也不像我们有多数习惯的惰性拖累着，而比我们能够更快地，几乎是一开始就在思想上，特别是在感情上，稳稳地站在革命立场上来看历史，来感觉历史。因此，在一些个别具体问题上，我们常常会一时疏忽或完全不自觉地离开了革命立场，但学生却会立即感到不妥。例如有位同志讲到我国初期工人运动时，说当时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苏兆征等为“工人头目”，说毛主席编《湘江评论》为“初露头角”，学生觉得以这样的词句加之于革命领袖，不够尊重，而立即提出抗议。这在说者决不是有意如此，而学生听来却马上就会感到不妥。这就是由于说者爱戴革命领袖的感情还不如学生，因而不留心竟会说出这样不足以表现爱戴革命领袖的言词来。

又如我谈到李大钊同志时称他作李大钊“先生”，这是由于我作学生时代，在北京大学那个环境里，所有师生员工几乎都是这样称呼他，

我便也一直习惯地这样称呼他。而我在课堂上这样说时,一般学生尚未理会,但从老解放区来,曾亲自经历过严重的革命斗争的学生,他们把革命先烈,特别是像李大钊同志这样的中国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共产党员,而且是党的缔造者和为党牺牲了的先烈,是当作亲人一样地怀念着的,而你不称他“同志”,却称“先生”,听起来就立即感到刺耳。但在我这个说者初无此感觉,其他一般学生也无此感觉,这就是由于我们这些人对革命先烈,对革命,在感情上还不够接近。上述二例都很细微,但也正因其细微,才尤其容易不注意。而学生却会提出纠正。这就形成了帮助我们,促使我们,在思想的进步上,在感情的变化上,非迅速靠近革命不可的力量。

如上所述,历史的事实和学生的反应,对我们都会发生一种推动思想感情靠近革命的力量;然而我们却不能听任自己只依靠这种力量,我们还须加强主观的努力。这就是说得加强学习,不只是史实的学习,尤其是理论的学习。学习史实可以增加我们热爱革命的感情,学习理论可以巩固我们这份感情。例如我们从史实中看到了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的曲折,所克服的困难的艰巨,倘使仅止于看到这种表面上的“事相”,在思想上还会以为这只要能吃苦和能坚持,就能熬得到今天的胜利。如果我们学习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特别是毛主席的著作,我们就会进一步从理论上本质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认识到掌握这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是如何地不容易,是如何密切地关系着中国革命的成败和中国人民的休戚,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休戚,我们才会产生热爱革命、热爱革命领袖的感情。毛主席说:“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①经过理论上的学习,我们的这份感情才能进一步地巩固起来,同时我们的认识才能进一步地深刻起来,这样感觉与认识相互为用,从而逐渐加强,继续发展,才会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地搁在革命立场上,不再因一时的疏忽而离开革命立场谈问题了。

^① 《实践论》。

革命感情是须从现实经历与学习体会中锻炼来的 ,要加强这种锻炼 ,对于我们这些很少有实地参加比较激烈的革命斗争的机会的历史教员来说 ,努力学习是最重要的 ,而且是别无其他的有效办法。到我们完全浸满革命感情从而也更深化对革命的认识的时候 ,才能彻底消灭我们站不稳革命立场的毛病。

(《历史教学》,1956年 10月号)

林则徐

摇摇林则徐(1793—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的父亲是秀才,多年做教师。清仁宗睿皇帝颙琰嘉庆九年(1804年)他 21 岁时考中举人。以后被福建巡抚张师诚聘入幕府办理公牍四五年,开始熟悉那时官府的行政事务。嘉庆十六年(1811年)28 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35 岁转御史,外放浙江杭嘉湖道。嗣后十年间历官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省按察使、布政使。清宣宗成皇帝旻宁道光十一年(1831年)39 岁升河东河道总督,次年调江苏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年)45 岁擢湖广总督。这是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以前的经历。他科名早达,壮年外任,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做到封疆大吏,仕途顺利,这在当时的汉员中尤为少见。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为人敬慎而办事认真。史称他“于政事无所不尽心”^①。他“与人和易温粹,虽卑官下僚,辄与坐论终日,鲜情容骄色,能使人尽言”^②,这使他了解下情,而人亦乐为之用。他“交寅僚能推功让能,虽自守以正,而不以名位矜己,不以贤智先人,遇政事宛转商榷,惟善是从,无隐情,无成见,各省督抚司道皆乐与公共事”^③。这就是说他能团结人。于是他博得好的“官声”,并得到道光皇帝的器重。

这时鸦片输入日多,已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道光皇帝下令各地将军督抚就此问题“各抒己见”。林则徐复奏极为赞成,并且指出若不认真禁烟,“数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 104,《林文忠公事略》。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

③ 《林文忠公传》。

十年后 ,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 ,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①。这两句话尤其触动道光皇帝对其统治危机的关切。同时 ,林则徐在两湖地区厉行禁烟 ,已有成效。于是道光皇帝特地召他进京“ 陛见 ”。他在这年十一月初十日(癸卯月 圆日)到北京 ,次日召见 ,一连八天召见八次(这在那时是很不寻常的) ,决定派他作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 ,并节制该省水师。

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癸卯年 员月 愿日)出京南下 ,循陆路驿站趲行 ,十二月二十一日(圆月 源日)到九江始换水路 ,春节(圆月 源日)是在船上过的 ,没有耽搁行程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癸卯年 猿月 员日)赶到广州。禁烟是正义的深合人心的大事 ,林则徐又是专办此事的钦差大臣 ,沿路官绅凡有资格迎迓的无不来见 ,每接谈至深夜 ,他这一路南行 ,为禁烟增添了声势 ,从官府到民间 ,使禁烟成为充满希望的话题。

林则徐到达广州 ,在命令洋商“ 呈缴烟土 ”的谕帖中严正宣示他此次办理禁烟的决心 :“ 若鸦片一日未绝 ,本大臣一日不回 ,誓与此事相始终 ,断无中止之理。”^②他团结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文武官员 ,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拥护 ,采取坚定周严的措施 ,迫使外国鸦片贩子缴出烟土 圆万多箱 ,共 圆园余万斤 ,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癸卯年 远月 猿日至 远月 圆日)在他亲临监视下 ,于虎门海滩当众销毁 ,取得禁烟斗争的重大胜利。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先向外国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的民族英雄 ,也是最先摆脱闭关自大的精神禁锢而放眼世界的政治家。他组织人员把一部刚在道光十六年(癸亥年)出版的有关西方国家基本情况的新著——英国人慕瑞(刁易揆 即 慕瑞)作的《地理大全》(忧国者译)翻成中文 ,并派员翻译过来 ,编成《四洲志》书稿 ,还派人经

① 《林则徐集·奏稿》。

② 《信及录·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常翻译外国书籍和报纸,注意研究各国的情况,制订出一套比较正确的策略。他主张严惩外国鸦片贩子的非法活动,但不禁止外国商人的正当贸易。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建议利用这种矛盾以孤立英国侵略者。

他于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准备抵抗英国的武装入侵。他督促水陆官兵认真操练,加强战备;他并且看到“民心可用”,招募渔民、蛋户编为水勇,加紧训练。他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方针,1840年秋冬之间,打退英国侵略者的七次武装挑衅,取得抗英前哨战的胜利。

这年12月,他被任为两广总督,在地方上的事权统一,更有利于备战;邓廷桢调闽浙总督,也作了战守准备。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派来的侵略军到达广东,企图进犯,被打败,北犯厦门,也未得逞。但是再往北的沿海省份防御就差了。英军继续北犯,七月陷定海,八月侵入白河口,直逼天津,投书清廷,进行恫吓。清政府惊惶变计,改派琦善赴广东“议抚”,林则徐和邓廷桢被撤职,并且要治罪。

这消息在广州传开之后,据《林则徐日记》记载,“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巷衢”,并且纷纷呈送颂牌,上面写着“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勋留东粤,泽遍南天”、“公忠体国”、“口碑载道”等等颂词。在那时候,对封建官员搞什么“攀辕”、“留靴”表示挽留,送什么“万民伞”、“德政牌”表示感戴,通常是地方士绅假借民意的阿谀奉承;但这一次对林则徐,是他处于被撤职并且要受处分的逆境中,则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义愤,反映了他们对林则徐的爱戴和对清朝廷的抗议。

琦善“议抚”不成,战争再起。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清廷给林则徐四品卿衔,又命令他迅赴浙江前线。他于五月初在广州接到谕旨,六月十日即赶到宁波。协同那里的文武官员,在镇海沿岸勘察地形,修筑炮台,试演大炮,紧张地忙碌了一个多月,忽又接到遣戍伊犁的谕旨,他只好又离开海防前线,远赴西北。

路经镇江时,他遇见当时的大著作家魏源,他们是朋友,他把自己为了解外国情况编成的《四洲志》稿交给魏源,嘱托魏源以此为底本撰写一部向国人介绍外国情况的大书^①——这就是后来成书百卷影响很大的《海国图志》。

这年夏天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林则徐在赴戍途中又奉命留河工效力。来河南总办河务的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在这年冬天特具折向皇上报告“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②,希望借此可以使林则徐获免发遣。翌年(1846年)三月间治河竣工,而朝旨仍命林则徐前往伊犁“效力赎罪”。这反映了以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代表的投降派在清朝廷中又占了上风。王鼎为此深感愤怒,和林则徐“涕泣为别”^③,回京不久就死了。一时盛传王鼎是因力保林则徐,严劾穆彰阿,皇帝不听,遂以死相争,“尸谏”身故的。这正是在英军侵入长江,清政府妥协投降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而禁烟有功、抗英有力的林则徐还是不得不踏上远赴西北边陲的遣戍征程。

他从河南西行,把夫人郑氏及长子汝舟等眷属留在西安,随带次子聪彝、三子拱枢,取道河西走廊前赴新疆。他于此时有《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其中有云“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这两句话道出了他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爱国主义崇高情操。

他从西安到伊犁一路写有日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1846年 7月 26日)启程,十一月初九日(1846年 12月 10日)到达,共走了四个多月。西北苦寒,后半程又进入冬天,越走越冷,常常是风雪漫路,有时还要睡在车上过夜。这年林则徐五十八岁,已是“望六”高龄,如此长途跋涉,可以想见其辛苦。邓廷桢先已被遣戍来到伊犁,他们在这里又能经常聚谈,唱和为乐,从中得到不少的慰藉。

林则徐在新疆三年,最后一年(1848年)他奉命勘办开垦事宜,

① 参见《魏源集·江口晤林少穆制府》。

② 《清宣宗实录》。

③ 《云在山房诗钞》卷远